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86

李汝珍及其
《镜花缘》

李时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86]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

李时人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李时人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2041-X

I. 李… II. 李… III. ①李汝珍(约1763~约1830) - 文学评论 ②古典小说 - 文学评论 - 中国 - 清代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704 号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

李时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64 千字 印张: 3 1/4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王维良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王颖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041-X/I·1779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全 100 册): 600.00 元



李时人，1949年3月生，辽宁锦州人。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出版的著述有《金瓶梅新论》、《西游记考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杰作选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等，主编有《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等。

目 录

- 一、“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翻新旧稗官”/1
——《镜花缘》的小说史和文化史意义
- 二、乾嘉学问终身事,名山事业在小说/12
——李汝珍的生平经历
- 三、潜心绝学知音少,“张真中珠”野史传/28
——《镜花缘》与《李氏音鉴》
- 四、海外奇谈夸博识,揶揄讽谕成诙谐/43
——《镜花缘》的形象和美学风貌
- 五、“礼失于野”天朝弊,“惟善为宝”怀占心/62
——李汝珍的思想和《镜花缘》的意象
- 六、古今难读“少子”书,学艺博戏笑中谈/75
——《镜花缘》中的学问才艺

一、“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翻新旧稗官”

——《镜花缘》的小说史和文化史意义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有一个女皇武则天令百花于寒冬腊月齐放的故事，清人李汝珍因以这个故事为引子，创作了一部内容奇幻、风貌独特的小说《镜花缘》。

书叙蓬莱山有一位百花仙子，总司天下之花。一日逢西王母圣诞，百花仙子往昆仑山赴蟠桃胜会，献“百花酿”为王母祝寿。席间，嫦娥要百花仙子下令百花一齐开放，以助酒兴，百花仙子不从，云：“若无上帝之旨意，即使下间人王有令，也不敢应命。”数百年后，心月狐下界转世为武则天，篡夺了唐室江山，自立为女帝，改国号大周。忠于唐室的徐敬业、骆宾王等起兵反对，不幸败亡，子女及部属流落四方。武则天残冬饮酒赏雪，乘醉下诏，命第二天百花齐放：“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适逢百花仙子在麻姑处弈棋未归，在洞的牡丹仙子等众位司花仙女无从请示，只好次晨冒雪开花。上帝因百花仙子并未奏闻，“听任部下逞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



广州芥子园道光十二年刊《镜花缘》扉页

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下令将百花仙子和九十九位司花仙女一并贬入凡尘。

百花仙子托胎为岭南河源县秀才唐敖之女，

取名小山。小山十二岁时，其父进京应试，中了探花，不料被人告发当年曾与徐敬业等结拜异姓兄弟，致被取消所得功名，仍为秀才。经此打击，唐敖意懒心灰，恰梦中得仙人指示，谓有名花十二飘零外洋，要其到海外解救，携归中土，因搭其妻弟林之洋经商的海船一同出海。海船一路上经过君子国、大人国、劳民国、智佳国、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歧舌国、女儿国、轩辕国等数十个奇异国度，林之洋上岸经商，唐敖则与见多识广的船上舵工多九公到处游览，因见识了许多奇花异草、奇禽异兽、奇风异俗，还经历了许多奇异之事。路上唐敖救助了不少因徐敬业事件牵连而流落海外的家属子女，还收了歧舌国枝兰香为义女，林之洋在女儿国历险后，也收了女儿国世子阴若花为义女，遂携带她们一起返航。因突遇风暴，海船被刮到小蓬莱仙山之下，唐敖前已意外吃到仙草，仙缘成就，因留诗以谢世人，入山仙去。

林之洋海船回国，唐小山知道父亲入了小蓬莱，要舅父带她至海外寻找。此时武则天已经下诏来年开科考试才女，林之洋劝小山在家备考，小山执意不从，只得带她与阴若花及女儿婉如等再次出海。途遇水怪、山精等，亏天上众仙救助终到小蓬莱。小山与若花两人上山寻找多日，不见父亲，却从一樵夫手中得到唐敖亲笔书信，命其改名“闺臣”，考中才女后再行相聚。两人再寻，则见荒冢，曰“镜花冢”，更进，则入“水月村”，复在“泣红

亭”见一石碑，上镌一百位花仙名号及托胎入尘世后之姓名，其中有“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梦中梦’唐闺臣”和“司牡丹花仙子第十二名才女‘女中魁’阴若花”。百人姓名后，又有总论，结末图章则云：“茫茫人荒，事涉荒唐，唐时遇唐，流布遐荒。”两人见事已前定，遂上船返归中原。途中又将唐敖等上次航海时所遇到的两位黑齿国才女卢紫萱和黎红薇带回中土参加科考。

唐闺臣回国后，与若花、兰音、婉如、紫萱、红薇等一起参加考试。历郡考、部考，礼部放榜时共录取了一百位才女，名次姓名全同小蓬莱“泣红亭”石碑中所记——原来这一百位才女就是被贬谪凡尘的一百位司花仙女。中式众才女连日饮宴、游园欢庆，各自表演其书、画、琴、棋之艺，以及谈论文史医卜、音韵算法，参加射鹄、投壶、蹴球、斗草、双陆、马吊、酒令等游戏，还有孟紫芝等人讲笑话、唱小曲。天上众仙女嫦娥、风姨和女魁星、麻姑等亦化身来此，或搅闹，或呵护。麻姑即席赋诗，涉及坐中诸女身世，自过去及现在将来，间有哀音，听者黯然，然不久意解，欢笑如初。

游宴活动以后，众才女各各分散。武则天册封若花为女儿国国王，又敕封兰音、紫萱、红薇为护卫大臣，被其国用飞车接回；唐闺臣则再去小蓬莱寻父，入山登仙。此时徐敬业等人之子起兵反对武则天，众才女多因夫妻、姻亲等关系投入军中。武则天令武四思兄弟领兵，在长安四周置西

一、“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翻新旧稗官”

水(酒)、巴刁(色)、才贝(财)、无火(气)四关，内设种种玄妙机关。在攻打四关的战斗中，有不少才女或战死，或因夫婿战死而自杀殉夫。攻破酒色财气四关以后，大军兵临城下。朝内张柬之等大臣趁武则天卧病之机，领羽林军诛杀佞臣张易之、张宗昌，迫使武则天归政于中宗。中宗复辟后，封赏内外功臣，仍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病愈，复下诏，准备来年仍开女科。云云。

《镜花缘》大体由海外游历和众才女游宴逞才两大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不仅都充满各种奇思妙想，有些可以说是匪夷所思，而且共同表现出一种“炫耀才学”的特征，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具有特殊风貌的作品。第二十三回，书中人物林之洋在海外淑士国信口胡编说中国有一部“《少子》”书：

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经》，讲的都是元(玄)虚奥妙；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著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象，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种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奥，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

“老子后裔”，当然是李汝珍自谓。所谓《少子》者，无疑指的就是《镜花缘》。《镜花缘》卷端当时人金柝的题词说：“百花璀璨阳冰笔，万丈光芒《少子》书。”也早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鲁迅说，这是作者“假林之洋之打诨，自论其书”。实在是李汝珍夫子自道，很坦白地道出了《镜花缘》“以小说见才学”的创作意趣和“学术汇流，文艺列肆”的特征。

其实，中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的“以小说见才学”的小说，并非李汝珍这一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设“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专章，所列除李汝珍《镜花缘》外，尚有夏敬渠《野叟曝言》、屠绅《螭史》、陈球《燕山外史》。因此，这样一类小说的出现，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上的时代风习，但是从小说史的角度看，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却不幸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式微。

本来，短篇早熟，长篇后起，是中国小说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从公元七世纪兴起到八世纪达到相当繁荣的唐人小说，如果译成现代语言，已经完全符合近世小说的美学要求，这比西方的散文体小说要早六七百年，而直到十五、十六世纪，《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陆续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在民间“讲史”、“说话”艺术的基础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三国》、《水浒》、《西游》不朽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尚源于集体累积的创造，正是特殊的创作过程和途径，

使它们成为小说史上无法重复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中国作家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的出现要晚到十六世纪后期，虽然其与生活同步的恢宏气势和逼视现实人生的力量，使其产生了惊人的“近代气息”，但从其依傍《水浒》和撮拾不少现成话本小说、词曲的作法，仍可看出其草莱初辟时种种艺术上的不成熟。由《金瓶梅》开创的中国古代作家长篇小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繁衍，到十八世纪前期，由吴敬梓和曹雪芹将其推向巅峰。其时，“康(熙)乾(隆)盛世”外衣遮掩下的不过是一个死而未僵的“百足之虫”。因此，富于感伤诗人气质的曹雪芹，用他的全部才情编织了一个凄婉的、无法重圆的“梦”，而追求理性思考的吴敬梓则带着哲人的苦笑描摹出一幅色调悲怆的“世相图”。《红楼梦》以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巨大涵盖和古典的、抒情的美，使许多读者为之歌哭，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光辉总结。《儒林外史》则和《金瓶梅》一样，在小说史上属于那种带有开创意义的作品，其不论在创作主体的使命感上，还是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对小说艺术方法的把握上，都表现出指向未来的巨大张力。曹雪芹和吴敬梓以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随着整个“封建文化”的加速衰朽，已经基本走到它的尽头，在整个文化结构发生变革之前，中国小说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腾挪的余地，无论是学步《红楼梦》，还是模仿《儒林外史》，都只能创作出二三流的，甚

至更加等而下之的作品,更不要说走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的老路了。

在这个意义上,《镜花缘》一类“以小说见才学”的作品的出现,对小说史来说,也并非完全没有探索的意义。因为小说是叙事艺术的最高形式,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所以,不仅小说作者本身需要学识才华——作者对历史、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描摹理应以一定的知识水平作为基础。而且小说作者在创作中,有理由突出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某些方面,包括知识才学在内。实际上,从唐人传奇“文体众备”特点,到宋元“话本”创作对作者“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的要求,中国古代小说继承了《诗经》有助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传统,从来不否定作品中应包括一定的知识才学内容。在强调道德教化的同时,也强调其传播知识的社会功利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原本就是一种传播包括自然、社会、历史、文学以及其他各种知识的载体——古代中国民众的许多知识往往是从小说戏曲接受来的,可为明证。或许,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之一。

事实证明,不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是不会写出好的小说的,真正好的小说也需要包含一定的知识内容,《红楼梦》如果不是蕴藉着无比丰富的知识才艺,也不会得到“中国古代文化百科全

书”的美誉。问题是《镜花缘》一类“以小说见才学者”的小说，离开了小说创作的美学要求，以炫学为目的，则实在走得太远了。诚如鲁迅批评《镜花缘》时所说：“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实在是“博识多通又害之”（《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章）。更重要的是，这些小说往往不以生活为源泉，却热衷于演绎书本，搬弄章句。这样一种疏远生活乞灵于书本的小说创作的倾向，颠倒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来说，实际走的是一条岔路，一条不能成为艺术出路的路。

确实，若以小说艺术论，这类“以小说见才学”的作品无论如何也不能望《儒林外史》、《红楼梦》之项背，即使是其中比较出色的《镜花缘》亦是如此。不过，在同是“以小说见才学”的作品中，《镜花缘》则无论在内容、形式和格调上，都比其它几部小说高出许多。《野叟曝言》标榜“熔经铸史”，实则臆造读书士子飞黄腾达显荣富贵之事，不过描绘了一个封建时代读书士子的白日梦，又教忠劝孝，大讲道学，诚如鲁迅所言，“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柢实同，惟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蟬史》假怪异之情节，勉造硬语，力拟古书，“探其本根，则实未离于神魔小说，其缀以褻语……尚承明代‘世情书’之流风”。《燕山外史》虽于文辞略有可取，然以骈文为小说，无

法再现历史生活之本来面貌，甚至人物对话也语必四六，毫无鲜活之气。相比而言，《镜花缘》虽然重在罗列才艺，却于现实多所感兴，时露讽喻，其列肆文艺亦常具匠心，较之夏敬渠卫道者的酸腐，屠绅、陈球的以古涩艳异之词掩盖凡近之意，李汝珍的小说“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他的讽喻“仍多迂拘”，但也不乏机趣，“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同样是以夸诞怪异的情节炫弄学问，《镜花缘》到底以调侃的笔触接触了一些世情，使艺术多少保持着与生活的联系。另外，《野叟曝言》等小说虽企图以小说见才学，但构思的框架仍未脱前人俗套，《镜花缘》却杂糅传统的历史演义、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于一炉，不拘格范为其创作旨趣服务，用书中作者自己的话说是“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翻新旧稗官”，使其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显得别具一格。

没落文化的最大特征常常表现在拜倒在祖先的智慧与业绩下面，咀嚼过去，向历史讨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生活的作家，求助于书本和由书本生发出来的玄想，是很自然的事。中国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这类“以小说见才学”的小说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反映了当时处于文化封闭状态下读书人的种种心态。而这一切又是整个社会文化昏沉麻木、因陈板结的时代性格所规定的。但《镜花缘》具有别具一格的品质，诸多方面表现了李汝珍的机智和才华，在那样一种

一、“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翻新旧稗官”

文化土壤中实在已经培育不出超出《镜花缘》水平的小说艺术的花朵了。另一方面，《镜花缘》“学术汇流、文艺列肆”的特点，又使其成为特殊的历史文化载体，使人们因此得以窥见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观念、知识、情趣和心态。

每一个作家都属于自己，但他同样属于历史，历史成全了李汝珍，使他无意中成了中国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最值得注意的小说家。《镜花缘》小说的独特风貌不仅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资料，足以引起人们从其他方面对其进行研究的兴趣。使其于小说史意义之外，同时产生了文化史意义。

二、乾嘉学问终身事，名山事业在小说

——李汝珍的生平经历

中国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出现的这几部“以小说见才学”的作品在小说史上虽然大略可以归于一类，同以小说为度学问的工具，旨趣却并不相同。略作比较则大体可知这几部小说实际分别联系着当时学术上的不同派别：《野叟曝言》的灵魂是奉程朱理学为主臬的“义理派”，《蟬史》和《燕山外史》代表着手段虽异而旨趣相通的两类专逞才藻的“辞章派”，《镜花缘》则与“考据派”有着深刻的渊源。也可以说，《镜花缘》的种种优点和缺点，都与作者李汝珍本身就是当时讲求学问、优游学艺的“乾嘉考据派”学者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原籍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但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他游宦的兄长到了海州板浦镇（今属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并长期居留于此。

海州现在是连云港市的一个区，原先却是一座古城。秦时设朐县，东临大海，始皇“立石东海之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即此，东魏时始置海州。